

红军长征纪实丛书

红一方面军卷

10

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



 中共党史出版社

红军长征纪实丛书



红一方面军卷

10

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



中共党史出版社

本册收入第十部分文章 61 篇

十、综合篇

情洒长征路

莫文骅

60年前，中国工农红军克服千难万险长驱二万五千里，在20世纪中国的版图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章。人们在惊叹这一伟大创举的同时，也抛出了一个硕大的问号：红军长征是怎么走过来的？

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这一壮举的老战士，我深切体会到，红军之所以成为一支打不乱摧不垮的队伍，正是由于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，共同的革命理想和阶级友爱把大家凝聚在一起，汇成了一股势不可当的钢铁洪流。长征路上，悬崖峭壁，滔滔江河，巍巍雪山，茫茫草原，饥饿寒冷，疾病酷暑，再加上敌人的围追堵截，飞机轰炸，可以说，红军每一天都面临险象绝境的考验。但红军指战员们你助我，我帮你，互相关爱，生死相依，路漫漫，情浓浓，谱写了一首首团结互助至爱情挚的人间真曲。

在长征刚出发时，我担任红八军团宣传部长。当时军团长是周昆，政治委员黄甦，政治部主任罗荣桓，党代表是刘少奇。本来，红军的团级以上干部都配备有牲口。而我的马在去八军团时因走不动留给当地苏维埃政府了。到八军团后，看到部队刚刚组建，没有什么家当，要从别处抽出一匹马给我确不容易。因此，自己不便开口提出要牲口。我天天跟着队伍徒步行军，翻山越岭，有时天下雨，道路泥泞，一不小心就滑步跌倒，弄得满身泥浆。走了十几天，一边工作一边走，体力渐渐支持

不住，脚开始肿了，只得拄根棍子，一瘸一拐地赶路。队伍经过广东边境进入湖南。一天早上，部队正在集合，我刚来到集合地，就听见有人喊道：“莫部长！”转头一看，原来是罗荣桓主任。我赶快跑过去，他高兴地对我说：“党代表少奇同志送给你一匹马。”说着，他马上引我去见少奇同志。

见到少奇同志，我敬了一个礼。他和蔼可亲地对我说：“你不是没有马么？你的脚肿了，工作又忙，前面的路还很长，你就把这匹老黄马牵去用吧！”

我听后十分感激地问：“党代表，这匹马给了我，那你怎么办？”他笑微微地答：“昨晚，部队打土豪，搞来一匹大骡子，送给了我，我的行李多些，还有书籍，骡子力气大，我把它留下了，这匹黄马就多出来了。”他停了一下，又接着说：“这匹黄马是我从瑞金骑来的，马虽老一点，但还健壮，又老实，走路小心，记性好，还有不少优点呢！”

我哪能要党代表的马呢？便推让说：“党代表，马还是你留下驮行李，或者换着骑吧，我另想办法解决。”

少奇同志马上认真地说：“我不需要两匹马，现在，你的脚肿了，比我和其他同志更需要马，不要再推了！”

站在旁边的罗荣桓主任也插话说：“快要出发了，党代表决定给你，你就要了吧，我帮你找了好几天，都找不到呢！”

在当时困难的情况下，少奇同志送给我这匹马，确是雪中送炭，我有了这匹马，在队伍里跑前跑后，做宣传鼓动工作更方便了。

1935年6月，我们来到了高耸入云的大雪山——夹金山下。这是我们长征途中要爬的第一座大雪山。山上终年积雪不化，只有夏天才能通过。当时，我们的衣服都很单薄，我穿的一双胶水鞋，还是在贵州打土豪时分给我的，已穿了好几个月，鞋底很滑，鞋头也破了，身上又没有备用鞋。别人提醒我说：“明天你穿水鞋怎能爬雪山？”对此，我是知道的，但有什么办法呢？只好用绳子把水鞋捆在脚上，免得松脱下来。

到了山麓，气温骤降，拐棍着地，碰着冻得梆硬的路面，发出“咯咯”的响声。爬山时越往上爬，天气越寒冷，空气越稀薄，呼吸也越困难。到了山腰，开始进入冰雪世界，雪花飞舞，狂风呼啸，周围一片浑沌，路越来越滑了。水鞋磨烂了，爬山更费劲，有时上一步，退两步，常常滑倒。同志们把我拉起来又继续往前走。大家互相催促：“快走，千万不能停下！”

下山时，我以为会好走一些了，谁知穿着这双水鞋，成了累赘，滑得更厉害，看着同志们往下奔跑，而我跌跌爬爬，渐渐落在队伍后面。我当时任干部团政治处主任，担负着全团政治工作的责任，需要走得快些，以便了解部队情况，做些宣传鼓动工作。于是我干脆丢掉了这双穿烂的水鞋，打着赤脚在雪地中行军。我原想咬咬牙，跑上一阵，身体发热，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，可当我赤脚踩在雪地上时，一股刺骨的寒气从脚底向上窜，霎时全身冻得直打哆嗦，牙齿不停地打颤。我立即踩在一块石头上，想休息一下，喘一口气。可冻石更冷，全身很快发麻冻僵，走不动了。后面的同志要搀扶我走，我说：“我不行了，你们别管我了！”这时，团政治处青年干事严长庆跑了过来，从背包里抽出一双自己备用的新草鞋送给我：“莫主任，快穿上吧！”在那关键时刻，一双草鞋，如同救人一命。我怀着感激的心情，穿上了战友这双新草鞋赶路，身上增添了力量，也慢慢赶上了队伍。这样，我们干部团终于在当日中午12时前胜利越过了夹金山。严长庆后来被派去苏联学航空，1945年回国在哈尔滨被苏军摩托车撞死了。我一直都很怀念他，若没有那双草鞋，我可能下不来雪山了。

在长征路上，这种生死考验的战友情谊成为我们制胜的法宝，前进的动力。我在上级干部队担任政治委员时，中央将董必武、徐特立、成仿吾、李一氓和冯雪峰等五位资格较老的同志分到我们上级干部队。这几位同志成了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，除了尊重、爱护他们外，还着重从生活上给予照顾。

有一天，部队在贵州行军时，因山路难走，大家走得很疲劳，拉的距离越来越长，中间接不上。队伍原来走大路，后来向右拐，上山走小路。前面的队伍将树枝拦在路旁作路标，示意部队向右上山走。可是，这五位同志拄着棍边走边聊，没有注意拦路的树枝，仍顺着大路往前走。当我们到达宿营地时，发现少了他们五位，收容队也说没有见到。那时真急死人啦，如果被敌人抓去或发生意外，那还了得！萧队长和我急得满头是汗，马上向军委报告。周恩来副主席很着急，立即发电报指示各军团帮助寻找。但在白区，找到他们的可能性有多大，天才知道！我们连饭也吃不下，急得没办法。直到半夜，接军委来电，说他们已走到红一军团那里，幸好路上没碰到敌人。我们听后，悬在心里的石头才放下来。第二天，一军团派人护送他们回来，在行军途中遇上他们，大家非常高兴。我们一方面向他们道歉，一方面向他们祝贺。他们却说：“应怪我们自己没注意看路标。”一场虚惊结束了，从此，我们更加注意关照、保护他们。

在卓克基休整期间，我去看望罗荣桓同志。当时他已调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巡视员，与中央机关一起，住在喇嘛庙里。在谈话中，我了解到总部机关生活比战斗部队更加艰苦，首长也常常忍饥挨饿，吃不饱肚子。我回想起在长征出发不久，罗荣桓主任分到一只鸡，他舍不得自己吃，请我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吃。现在我能帮他什么呢？我想起自己还有准备行军时用的烧饼，便说：“我住处尚有15个烧饼，送给你吧！”罗荣桓同志客气地谢绝：“还是你留下用吧，你在战斗部队，是饿不得的！”我恳切地说：“明天一定派人送来，我再另想办法。”他看我态度坚决，只是笑着说：“好吧，我明天去看你，在你那里吃午饭。”他又问我住的地方，我用手一指说：“就住在对面的半山腰上的一间小屋里，看起来很近，走起来上山下山也有十几华里，还是我派人送来吧！”他坚持要去看我，我也只好答应了。

次日中午，罗荣桓同志和总政治部的王盛荣同志一起来我处赴

“宴”了。我们喝着冰凉的泉水，痛快地吃起烧饼，饼虽没油没盐，可都觉得好吃，不一会儿，15个烧饼吃剩了三个。我把剩下的三个包起来给罗主任带走，他不同意，笑着说：“你不坚壁清野已很好了，又何必一扫而光呢？”后来我还是硬塞给了他。

在极端困苦的日子里，军委机关也苦得很。一次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军委一局局长张云逸同志患病，军委机关的同志曾告诉我们：若弄到肉或油送来一点给生病的首长补补身子。我把这事一直记在心中，可一连几天也没有弄到。一天部队供给处给我分来了四两腊肉，我便让勤务员小刘把肉切成两份，给周副主席和张局长送去。这件事，张云逸同志一直记在心里。解放初，我在北京见到张老时，他便提到长征中我送腊肉的事，他说，那二两腊肉，比现在请我吃烤鸭还好啊。

原广西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、上级干部队学员雷经天同志，是以一个士兵的身份参加长征的。他在将近走完草地时，不小心跌下一水沟，幸有同志把他拉起来，但衣服湿透，嘴唇发白，脸色铁青，全身发抖，坐在路旁，无法继续前进。适我经过此地，问其究竟，见他这个样子，危险至极，好在我身上还带几片干姜，我立即拿两片给他口含和擦身，并从马袋里拿出一套旧单衣给他换，不一会儿，他嘴唇变红，也不发抖了，再休息一会儿，便能拄着拐棍继续前进。1956年，他来北京我家做客，一进门便对我大儿子安来说：“过草地时，是你爸给我两片干姜，救我一条命！”

原红七军干部、干部休养连队员李爱民同志，1927年曾与我一起在南宁坐过牢，他曾在干部团当连政治教员，在金沙江时曾和部队一起打冲锋，过草地前的一天上午，他拄着拐棍，来政治处找我，说他几个月来疾病缠身，缺医缺药，身体一天天垮下去，过草地无法自己背行李和柴米，请求我帮他找匹马。我听后，看到他面容枯槁，既感到同情，也感到为难，我安慰他几句说：“你先回去，我尽量想办法，请你下午再来看看。”他走后，我立即找有关人员商量，总算设法调剂一匹马给

他。当他接到马时，激动得流下眼泪。我说，没有马夫。他说：“得了，不要了”。说完便拉着马走了。开始过草地时，他有时骑着马走，有时牵马而行，因草地既软又有泥潭，马走得吃力，时常跌下沟里，要人用力拉上来。后因天空经常下毛毛细雨，马整天吃湿草，拉稀了，他既要照顾自己，又要照顾马，弄得更加疲惫。最后，马卧下走不动了，他只得舍弃了马，拄着拐棍，一步步挪动，以坚强的毅力，终于走出了草地。

漫漫征途中，这种团结互助、互相爱护的事不胜枚举。中央红军出发时有 8.5 万人，到陕北时只剩下约 7000 人。可以说，我们这些幸存者是靠无数战友用生命换来的。没有他们作出的牺牲，就没有长征的胜利。60 年来，我无时不怀念那些牺牲了的战友，那些给我帮助的同志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愈加珍视和难以忘怀这种经过生死考验的战友情谊。

原载《解放军报》1996年9月24日。

忆红军长征中的干部团

宋任穷

1934年，在敌人对我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“围剿”中，我被王明“左”倾冒险主义者撤销了五军团十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，调到瑞金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学习。这个科是训练军队高级干部的，学员不多，不过一二十人。现在记得的有程子华、张宗逊、郭天民、杜中美、袁良辉等同志。长征前夕，成立红军干部团，我被调到该团工作。

红军干部团成立^①

1934年10月，红一方面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长征。出发前夕，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，中革军委决定：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所红军干部学校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。这四所学校是：红军大学（又名赫西斯大学，以在广州起义时牺牲的苏联赫西斯烈士的名字命名）；红军第一步兵学校（又名彭杨步兵学校。为纪念彭湃、杨殷二烈士而命名）；红军第二步兵学校（又名公略步兵学校。为纪念黄公略烈士而命名）；特科学校。中革军委任命原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同志为红军干部团团

^① 干部团当时直属于第一野战纵队（即军委第一纵队），下同。

长,我为政治委员。参谋长是钟伟剑同志,遵义会议以后为毕士梯同志,又名杨林,朝鲜人。干部团下设四个营和一个上级干部队(简称“上干队”)。按照原来四所学校的性质,彭杨、公略两所步兵学校编成三个步兵营,一营、二营培养连排长干部;三营培养连政治指导员;四营是特科学校编成的特科营,培养炮兵、工程兵、机枪干部;红军大学编成上级干部队,培养营团军政干部。四个营的干部是:一营营长李荣,政治委员丁秋生;二营营长黄彦斌,政治委员苏启胜;三营营长林芳英,政治委员罗贵波;四营营长韦国清,政治委员黄金山。上干队队长萧劲光,政治委员余泽鸿。四个营和上干队都设有军事教员、政治教员和文化教员若干人。全团共1000多人。

干部团随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行动,归叶剑英同志直接指挥。我们这个团的学员都是从部队选调上来的、有战斗经验的班排长以上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员。我们的主要任务是:警卫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,保卫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,并负责储备、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,必要时也参加一些战斗。因此,我们一边行军打仗,一边尽量利用行军宿营或部队休整的间隙,对学员进行训练。如进行过遭遇战、伏击战、强渡江河、穿插、迂回、袭击等军事科目的训练。由于连续行军疲劳和战斗频繁、紧张,这种训练时断时续。可以说,干部团既是一支战斗队,又是一所培训红军军政干部的学校,长征途中陆续为部队输送了一批干部。遵义会议以后,部队进行了整编,中央把一些老同志送到干部团,由我们保护和照顾。如董必武、徐特立两位老同志,还有成仿吾、冯雪峰、李一氓等同志都到了干部团。毛泽东同志对陈赓同志和我讲:“董老、徐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,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。”

董老和徐老年纪比我们大得多,长征途中和大家一样同甘共苦,他们很少骑马,经常把马让给病伤员骑。徐老还常常照顾他的警卫员。大家对这几位老同志都十分尊敬、关心和爱戴。每次行军、宿营,我们都要认真检查,看看董、徐二老和其他几位同志到了没有,问问他们的身

体状况如何等。

长征开始时，中央后勤队伍非常庞大，携带了大批行李、辎重，包括修械所、印刷所、X光医疗器械，还有不能用的大炮等，“坛坛罐罐”很多，活像大搬家。这些都由干部团等部队负责警卫、掩护。蒋介石得知红军转移，即调集粤、湘、桂、黔各省地方军和一部分中央军对我们进行围追堵截，在湘粤边界、湘南、湘江附近连设四道封锁线，企图全歼我军。在数十万敌人穷追不舍下，这种大搬家式的行军，不仅使干部团，而且几乎使所有战斗部队都变成了掩护队。部队庞大、累赘，行军速度缓慢，一天走不了多少路。为了隐蔽，经常夜行军，走山路。山间小道蜿蜒崎岖，部队拥挤不堪，我们沿途处处被动挨打。疲惫、饥饿以及接连不断地与敌人战斗周旋，对我军是严峻的考验。就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，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，边走边打，从福建、江西出发，经湖南、广东，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，于1934年12月初渡过湘江，到达广西境内。过湘江时，我军同敌人打了一个大仗，为了掩护整个中央红军过江，八军团殿后，伤亡很大，五军团的三十四师和三军团的十八团没有渡过湘江，几乎全军覆没，在王明错误路线指引下，我军离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才短短三个月，已折损过半。

这时，蒋介石已经觉察到我们的意图，调集了十几万大军等在湘西。面对这一形势毛泽东同志极力主张放弃原定去湘西的计划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。12月中旬，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，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，决定向川黔边境挺进。这样可把十几万敌人甩在湘西，红军才能摆脱险境。这时，我军紧缩编制，撤销八军团番号，并入五军团；并丢掉了不必要的辎重，对主力部队进行了充实。这样做，我军有了转机，接连攻占了贵州东部的许多县城，于1934年底抵达乌江南岸。

架浮桥渡乌江

干部团在贵州黎平休整后，经锦屏、施秉、黄平等县，跟随中央军委纵队抵达乌江南岸。在猴场附近举行了联欢晚会，迎接 1935 年元旦。次日，一军团二师四团由团长耿飏、政治委员杨成武同志率领在江界强渡乌江。干部团奉命派出特科营工兵连，在耿飏，杨成武同志统一指挥下搭浮桥渡乌江。

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江，两岸高山望不到顶。陈赓、韦国清同志亲自率领特科营工兵连，星夜急行军 60 里，赶到江界河渡口。砍竹、伐木、扎竹排。由于乌江水深流急，河底石头大而光滑，桥桩难以固定，几次被急流冲走。工兵教员谭希林、何涤宙同志，对架桥很有经验，他们想了不少办法，最后用竹篓装石头，两个竹篓上下扣住，中间用硬木架成十字，捆绑结实后沉入河底，以此代锚，才固定住了浮桥。经过紧张战斗，终于克服了器材缺、工具少、军情急、时间紧的种种困难，把浮桥架到了乌江对岸。我中央纵队和各军团迅速渡过乌江，直下遵义。

在遵义，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。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。会议对几乎断送革命和红军的王明“左”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进行了批判。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，之后，在行军途中，又组成了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。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“左”倾冒险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，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。王稼祥同志从革命不断受挫中逐渐认清了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危害，对之产生了强烈不满。在遵义会议上，稼祥同志旗帜鲜明地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，在关键时刻立了功。记得我军再次攻克遵义后，部队稍作休整，中革军委在天主教堂内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，正式传达遵义会议

精神。那天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、王稼祥等同志都来到会场。由张闻天同志传达。同志们听了传达后，一扫过去的疑虑和不满情绪。个个称快，同声赞好！有的甚至高兴得流出了眼泪。对吃够了王明“左”倾冒险主义苦头的红军指战员们，这是激动人心的大喜事。从此，红军长征才从千难万险中找出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。这时，处在历史转折重要关头的红军，士气之高昂，信心之坚定，是前所未有的。

激战土城和再克遵义

为了尽快摆脱几十万敌军从四面八方对我红军的围追堵截，遵义会议后，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红一方面军展开大踏步前进、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。我军避实就虚，声东击西，仗打得非常机动灵活，经常出奇制胜。为了打乱敌人的部署，调动敌人，我们四渡赤水，围贵阳、逼昆明，牵着敌人的鼻子走，使他们对我们的去向捉摸不定，被我们调遣得团团转。这时，我们已经开始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。

四渡赤水期间，干部团直接参加打了两个仗。一个是在一渡赤水之前打土城，一个是在二渡赤水之后再克遵义。

前一个土城之战是场恶仗。土城位于贵州西北部的赤水河畔。遵义会议以后，中央即决定红一方面军向黔川边境集中，准备在四川泸州、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。这时，敌人为了阻止我军入川渡江，调集滇、川、湘、黔和蒋嫡系部队约20万人，形成了一个包围圈，企图歼灭我军。

1935年1月28日，我军由遵义附近进抵贵州西北部的赤水一带。在土城枫村坝、青岗坡与敌人发生激战。首先由三军团、五军团投入战斗。当天中午，战斗异常激烈，干部团奉命增援，整个战斗由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同志亲自指挥，我们的对手是敌四川模范师郭勋祺部和潘佐

部，他们有六个团的兵力，装备精良，弹药充足，又抢占了有利地形，后援部队也上得快。在我军猛烈攻击下，敌一部被击溃。但是敌居高临下，我们只能仰攻。陈赓同志令特科营重机枪进行掩护，我团学员端着步枪向上冲锋。敌人打过来，我们打过去，有时同敌人进行肉搏战，打得十分激烈和艰苦。每前进一步，都要付出血的代价。干部团的同志们打得很勇猛、顽强，眼看攻到了郭勋祺的指挥部附近，但又被敌增援部队的炮火压了下来。我团又发动了几次进攻，均未奏效。一直打到黄昏，一军团一部来参战。但我阵地已经缩小，我军难以展开战斗。正在敌我僵持不下、难解难分之际，朱德总司令亲临战场视察，觉得再打下去对我不利，立即命令我军后撤。当天深夜，我军一渡赤水河，向南开往四川边境古蔺一带，暂时甩掉了敌人。

敌人怕我军向北抢渡长江，长江南岸沿线各城镇和渡口，早已陈重兵把守，被我甩在赤水河东岸的郭勋祺等部迅速追了过来。我军硬打不利，即由四川古蔺、叙永一带，移师转向云南东北部。阴历大年三十，我们到达云南扎西。除夕夜晚，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下了一夜，山山岭岭、沟沟壑壑，全被大雪覆盖。我军在扎西一带稍作休整。

这时，干部团上干队的政治委员余泽鸿同志，由中央决定调到四川开展游击战争。他是四川省长宁县人，曾在上海作地下工作。1929年，任党中央秘书长。我们在扎西分手后，他先后担任中共川南特委宣传部长、川南游击队政治部主任和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政治委员。1935年12月，不幸牺牲，时年32岁。我和余泽鸿同志相处虽然时间不长，仅短短几个月，但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高尚品德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我是很怀念他的。

干部团参加打的另一仗是再克遵义。我军到扎西后，四川、云南敌人十几个旅追了上来，遵义附近敌兵力薄弱，我军便二渡赤水河，进占贵州桐梓。中革军委指示：“坚决消灭娄山关之敌，乘胜克遵义城”，并指示夺取娄山关，是“开展战局的关键”、“对野战军顺利转移至关重要。”

娄山关是遵义的北大门，位于娄山之巅，四面群山如剑，是川黔交通的险关要道。我三军团第十三团和一军团第一团攻克娄山关，击溃附近之敌。这天，我干部团奉命由桐梓出发，一天走了120里，由上千队接替三军团十三团扼守娄山关。我团其余全部奔赴遵义城西南，与一、三、五军团一起，对蒋军周浑元部以及吴奇伟两个师展开激战。敌一部固守遵义城石羔咀西南端制高点老鸦山。在老鸦山战斗中，三军团十团张宗逊团长负伤，钟伟剑参谋长牺牲，只有黄克诚政委一人在指挥战斗。陈赓团长和我带着干部团刚进入阵地，便顶着打。我们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，配合十团消灭了一部分敌人，敌残部撤退，我军夺取了老鸦山。一、三、五军团主力歼灭了遵义城内外的敌人，敌残部溃逃。遵义被我第二次攻克。这一仗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，俘敌3000余人，是长征来打得最漂亮、战果最大的一次胜仗。

土城战斗和再克遵义的战斗，打得都很激烈，在土城战斗中干部团损失不小，伤亡百十来人，令人十分痛惜。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，有个优良传统，一向非常爱护干部，重视培养、训练干部。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是这样，在长征途中也是这样。红军干部团的成立，就体现了这种优良传统。以后，我就干部团在土城战斗中的伤亡较大一事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。我说：“干部团的学员都是连排以上干部，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，这样使用代价太大了。”毛泽东同志同意我的意见。非常惋惜地说：“对啊，对干部团的学员用是要用的，但这样用不行，以后要注意哩！”

重架乌江浮桥

1935年3月中旬，干部团在贵州茅台附近三渡赤水时，担任渡河两岸的警戒、掩护任务。我们按中革军委指示，先派出一个营到河西，